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五六二期 ——
(二〇〇七年三月十九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703d)

【各抒己见】无胆虎山行 打狗论英雄 ——《聂元梓回忆录》引起话题	歪脖子树
【史料辨析】中共中央是如何镇压造反派的	老 田
【拒绝遗忘】最早洞悉文革真相的人	傅国涌
【研究动态】昔日中国与今日中国之对谈	刘见林
【荒唐年代】“学代会”闹剧	周孜仁
【千秋功罪】为了铭记、埋葬和解魅——悼念王光美	徐时利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各抒己见】

无胆虎山行 打狗论英雄
——《聂元梓回忆录》引起话题

• 歪脖子树 •

◇ 历史的回顾

毛泽东酝酿发动文化大革命启动了两个女人，一个是他的贱内江青。江青早已不指望向毛泽东乞求床第之欢，却存心在政治上争宠。她秘密筹备干柴燃油，趁夜色悄悄地堆放在刘、邓屋檐之下。一切布置就绪，毛泽东又启用了另一个女人，这就是外围的聂元梓，利用她向中南海院内丢一个火把。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毛泽东的“何等好”，一下把聂元梓捧成了大红大紫的特等角色。

很难说聂元梓的马列主义水平有多高。她只是一个在共产党政坛上摸打滚爬炼出来的一个嗅觉灵敏、善于随机应变的人。聂元梓经历过延安整风、57年反右、59年反右倾的风浪，知道党争的利害，决不敢贸然上房拆瓦毁了共产党的庙。但是在她从内部文件得知，彭真、陆平、彭佩云等一伙，已被毛泽东朱批开刀问斩，不由得激起冒犯顶头上司、越级邀功的欲念。在起草大字报之前，还通过内线向康生的老婆曹轶欧讨口风，得到肯定后，才斗胆擦出这么一串马列主义的火花。

在聂元梓左派大运亨通的时候，毛泽东的女儿李纳直接穿梭于北大和中南海，和她热线联系。李纳传达父主席的指示，让聂元梓组织一帮人到上海串联，夺上海市委的权。随后，红旗杂志发表社论，传达毛的战略部署：“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上海的夺权行动并被誉为“一月革命风暴”，迅速蔓延全国。这一阶段的聂元梓与无产阶级司令部配合默契。聂元梓的破坏能量也得到最大发挥。

聂元梓曾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组长、中共九大候补中央委员。除去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聂元梓在文革中又抢了3个“头功”：第一是揪叛徒。聂元梓等人诬蔑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是叛徒，导致这些老干部锒铛入狱；第二是诬蔑朱德委员长。她召集手下炮制了《历史的伪造者、反党野心家——再评〈朱德将军传〉》等文章，在国内外造成恶劣影响；第三是贴出全国第一张炮打邓小平的大字报，同时迫害邓小平子女，邓朴方被迫愤而跳楼，导致终身瘫痪——在北大校园内，聂元梓以钦定大左派自居，对于反对派群众残酷镇压，一些无辜学生或被打死或被逼死……

聂元梓的大运也就有三年光景。革命造反派之间无休止的权力争夺，令毛泽东对五大学生领袖很快厌倦，到了工军宣队出场、“小将犯错误的时候”。确切地说，不是小将们不想跟着毛主席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而是毛主席不想让他们跟了。毛泽东断掉了和学生领袖的热线联系，这些狂妄自大的造反派顿时变成无头苍蝇，乱冲乱闯，“犯错误”本在预料之中。

聂元梓泡沫崩溃的更快一些，1969年11月聂元梓被发配到江西鲤鱼洲北大分校农场劳动改造，1971年被隔离审查，限制自由活动。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聂元梓被判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1984年6月获保外就医，1986年获假释。

◇ 一本正经的审判

把对四人帮及其同党的审判，说成“一本正经”的审判，那是因为在审判之前就有了一个正正经经的脚本。就像样板戏一样，其中台词、唱腔、布景、灯光、都预先作了精心的设计，审判如演戏。

邓小平及其后来的共产党的领导人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拨乱反正，只是要求清理出一块自己执政的舞台，在此范围之外的场地再肮脏、再黑暗也不去追究。对于文革案件审理，邓小平采用了“只灭宗亲，不挖祖坟”的韬略。对于跟随毛的四人帮及其羽翼，不客气地一律剪除；涉及毛泽东本人的罪恶，统统巧饰掩盖。因为邓小平等人毕竟还要接过毛泽东的这份遗产，如果鞭了毛泽东的尸骨，他们继承的正当性又会遭到非议。

江青在法庭大喊：“我是毛泽东的一条狗，毛泽东让我咬谁我咬谁！”全天下的人都听见了，唯有审判长江华听不见。他硬说江青这条贴身狗，是背着毛泽东出来咬人，一咬就咬了十几年……

审判聂元梓，和审判四人帮如出一辙。在聂元梓陈述到李纳口头传达毛泽东指示，聂元梓

奉命到上海造反时，就一律叫停，既不做调查，也不予采信。

聂元梓被判17年徒刑，罪有应得还是判刑过重？没有一个中国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共产党领导的司法，可以说天网恢恢，有疏有密。疏的空洞可以通过骆驼，密的网眼可以捕捉蚂蚁。而且那法网还是橡皮筋编制而成，其弹性系数由党的官员临时设定。

聂元梓被判得太轻了！与同是北京大学的右派分子林昭相比，林昭只是言论上反党，她顶多刺破自己的手臂蘸取鲜血在床单上写下几首诗，而且还没有机会发表。林昭被判处死刑。聂元梓进行反革命活动有大规模组织，涉及全国范围。她还策划武斗，迫害反对派，诬陷老干部，并有间接血债，对比之下，枪毙也不为过。

聂元梓判得太冤枉了！与指示她做恶的文化大革命元凶毛泽东相比，简直是讽刺。毛泽东至今安详地卧在水晶棺，接受崇拜的香火。照这个标准，聂元梓等五大学生领袖，应该刻成汉白玉雕像，守护在水晶棺的四周，分享奉祀。聂元梓等人的造型，应该是吹着小喇叭，举着马列主义的火炬，张着一对洁白翅膀的小天使。

◇ 愤怒的胆小鬼评论

最近华夏文摘增刊556期，刊登出薄亚达先生的文章：“专制政客的翻供状——评《聂元梓回忆录》”，文中揭露了聂元梓上推下卸，掩盖或回避在北大无情打击《井冈山》红卫兵，残酷迫害《虎山行》战斗队的罪责。

北大的《虎山行》战斗队，敢于和钦封大左派斗争，而且《虎山行》中有一些人有更深一层的思索，质疑文化大革命的正义性和合法性，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些人的观点在当时不能搬到台面上，虽然是一股暗潮浮动，却不愧为一种有历史深度的独立思考。作为专制政客的聂元梓，对于这些有思想的同学横加迫害，并不奇怪。

倒是薄亚达先生有一些奇怪议论。

薄亚达先生叙述，聂元梓在1968年毛泽东“七·二八召见”时，趁机告《井冈山》的御状：“侯汉清在社会上搞了一个反动集团，恶毒攻击主席、林副主席”。然后，薄亚达先生满怀感恩之情说：“毛泽东显示了一个老人的精明与仁厚。他没有采信聂元梓的谎言，从而避免加害侯汉清与《井冈山》”。

最后，薄亚达对聂元梓盖棺定论，也是以毛泽东的好恶做这棺材上的钉子：“聂元梓紧抱着封建专制的衣钵，以专制手段和权术为护身法宝，愈到后来，愈让人们所不耻和嘲笑。当年曾树她为‘文革’旗帜的毛泽东主席，开始确曾多方支持她，庇护她，但在后来，他的道德法眼也看透了聂元梓的品质，知道看错了人，用错了人，从此弃之如敝履……”

在这里，薄亚达对专制政客十分痛恨——这理所当然，却对制造了专制政客的专制君主满怀柔情——令人乍舌。按照薄亚达所描述的《井冈山》反聂元梓行动，充其量也只是封建王朝的一次“清君侧”行动，而且泽东大帝老而不昏，独具道德法眼，《井冈山》的勤王之师还未开拔，大帝就已经自清其侧了。精明哉！仁厚哉！

且不说毛泽东根本不信“道德”说教——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一个毁弃文明道德的残暴革命；毛泽东也没有什么“道德法眼”——他明知道康生、江青无道德可言，为了政治利益也要收为心腹。毛泽东对于聂元梓也是如法炮制，启用于有用之时，抛弃于失效之刻，谈不到什么

看不看错人。同样从实用出发，对于《井冈山》，毛泽东没下绞杀令。他只不过认为，其存在正好平衡正在失宠的聂元梓力量，有利控制北大形势，如此而已。薄亚达大感知遇之恩，表错情了。

在北大校园内，还有人为杨克明愤愤不平。原因是杨克明是马列大字报的起草人，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左派桂冠，风光都被聂元梓独家占尽……像这种水平的反聂元梓，无非是杂牌和嫡系红卫兵向毛泽东争宠，是和聂元梓抢夺一个为虎作伥的优先权罢了。

1969年11月后，聂元梓失势被软禁，已经从北大历史舞台消失。控制北大的是毛泽东的新贵谢静宜，新的代言人是“梁效”。新贵们率领高校进入毛的下一个伟大战略部署：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没有聂元梓的北大依然处于思想禁锢、红色恐怖的状态。显然，不管拥聂拥毛还是反聂拥毛，在历史的天平上，很难看出有什么分量不同。所谓“天派”、“地派”，统是春秋无义派。

如果到今天，《虎山行》的队员们还停留在薄亚达一般见识，那《虎山行》真是浪得大名了，你们根本没有胆量上山打真老虎，只是在山脚下遇到一两只狗，忽悠了两棒子，就自称打虎英雄了。而且那只狗还是被虎王放逐的流浪狗。

北大，曾经是民主、自由发源地，后来日益凋敝枯竭。57年出了个思想先驱者林昭，却不能在北大完成学业，并终于被党枪毙；近年有焦国标、余杰两位冒出一些异端言论，则不能在北大立脚……北大已不是铺着柔软衬垫的自由思想摇篮，而是一个龃咧着针刺的荆棘窝。

薄亚达对北大的溢美之词：“北大真是中国一块民主的圣地……”且当他说的是60年前的历史。如果说的是现状，就让人忍俊不禁了。倘若北大校长尚存一丝良知，会惭愧地自掴耳刮子。

◇ 再说聂元梓

聂元梓女士已经为她的恶行付出了多年牢狱生活的代价。但是她一直不服判决，并且一直上诉抗辩，这是她的权利。

对着孑孓暮年的聂女士，我有一个建议：建议她转换一下角色。由“辩护人”的立场转移到“见证人”的立场。

作为辩护人，总是以摆脱罪名为目的。列举事实，总是把有利于自己的突显出来，而不利自己的事实，总是提防控方指证。控方不能证实的，只当是不存在。而做“见证人”就要首先从被告席上解放出来，将自己的亲身经历毫无遮掩地叙述出来。哪怕是没有法律意义上的旁证，只要是确实发生过，就如是说。

这涉及到如实重现自己的恶行恶状，需要痛定思痛的勇气和良心。做为一个历经沧桑的人，应该明白，忠实叙述自己的恶行，是一种善行，而且善莫大焉！未来的历史学家会感谢你留下真实的史料，人们会肯定这种人性光辉的复明。在这里，历史的“见证人”比被告“辩护人”更有人的价值。

聂元梓女士在回答明报记者提问，论及对毛泽东的评价时，说了八个字：“功勋卓著，罪恶滔天。”这是聂女士历尽荣辱，从热烈追捧独裁寡头，到冷漠旁观专制制度得到的结论。

批判聂元梓的人，可能比早期的聂元梓明智，未必有晚年的聂元梓深刻。

聂元梓对于毛的评价，我觉得如果再插入两句就更贴近事实：

功勋卓著，利泽一党；罪恶滔天，祸殃天下。

~~~~~

## 【史料辨析】

### 中共中央是如何镇压造反派的

• 老 田 •

文革期间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在全国造反派中间抓出反革命分子一千多万人，这是文革期间最大的冤案，受残害的无辜者数量惊人，占文革期间冤案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由于吴德等人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仍然把持中央专案组，胡耀邦等人在甄别冤案时对此也不闻不问。今天国史党史研究中间，对五一六冤案问题还设置禁区，很多关键问题仍然是云遮雾障。

根据前中组部部长宋任穷的回忆，五一六专案材料在七八年后移交给中组部处理了，而且相关专案（包括审查干部的专案）不存在四人帮插手的问题。“我刚到中组部时，在落实干部政策工作上，首先遇到的是接收并复查平反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第三办公室和‘五·一六’联合专案办公室移交给中组部的大量案件。中央专案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成立的。本来党中央在1978年6月就曾确定把原中央专案材料全部移交中组部，但专案办的主要负责人把着不交，说什么：专案办没有‘四人帮’干扰。”“1978年12月19日，由原中央专案负责人汪东兴和纪登奎、吴德召集中央专案组和中组部的同志讨论交接工作。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副部长陈野苹，公安部部长赵苍壁等同志和3个专案办以及中组部干审局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会上宣布：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第三办公室、‘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办公室，自即日起撤销。所有专案工作，一律交中央组织部办理。在移交过程中，不准销毁材料。会议后各专案办公室即停止办案；已送交中央档案馆的专案材料，全部调出，统一交中组部。”（《宋任穷回忆录》（续集）解放军出版社1996.8，第77—78页）胡耀邦等人主持平反冤假错案的时候，对文革期间受审查干部的案件，基本上无论对错都予以平反了，但对于涉及大量群众受残害的五一六冤案，即便是掌握了大量专案材料，且明知是重大冤案，却不闻不问。更为奇特的是，武汉文革期间制造的五一六冤案涉及到六十多万人，胡耀邦单单为宋洛一个人作了平反处理（有人说这是因为宋洛有一个亲戚在中组部工作，跟胡耀邦讲得上话），胡耀邦甚至让中组部违反组织原则单独下文件为宋洛平反（宋洛本不是中组部管理的干部），而对于武汉存在的数十万件五一六冤案，则听之任之。中央五一六专案小组的组长，六八年是陈伯达担任，七〇年陈倒台之后由吴德接任。五一六冤案的扩大化，正是从七〇年“一打三反”运动开始升级和全面铺开的，吴德还说他借着周总理“批极左”的指示，也作了很多的努力。

前北京市高官吴德的回忆录对此也有涉及，从而对于我们了解五一六冤案内幕有所帮助。（见本刊zk0702d，吴德：“北京市抓‘五一六’的情况”——编者）在吴德的视野里面，之所以要抓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有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北京市革委会的成员很多是“戚本禹的人”，他还借周总理之口说这些不清理就“稳定不了、工作不了”，抓反革命分子的第一个理由是要解决革委会内部的权力份额分配问题，把掌握在造反派手里的权力夺回来，经过吴德的努力之后，实际上“等于”改组了北京市革委会，调回了“大多数不是造反派”“没有什么派性”的干部重组了革委会，最后通过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达到了把“五大领袖”拿下的目的，这五个人在北京市革委会里头分别担任了副主任和常委。第二个原因是吴德反复强调的，

他罗里罗嗦说了一大通，其实就是找一个当权派清理五一六的“道义借口”，吴德说彭德怀挨打和朱德、陈毅等人被人贴大字报，并提出口号“谁反总理，谁就是反革命”，还说这些都是戚本禹等人驱使造反派干的，翻译成为民间的通俗语言，就是你们这些造反派反对当权派在先，所以现在要进行报复，至于吴德是否特别关心那些被触及的老干部如张霖之等，则大有疑问，在这个意义上吴德是把当权派（老干部）和造反派作为对垒的两个不同阵营来看待的，造反派攻击在先，吴德们反击在后，没有什么党纪国法可言，清理五一六只是一派对另外一派的问题。第三个理由是很现实的，就是要建立起革委会的合法性和威信，并且以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来行使权力，只要是反对革委会的，就作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论处，按照吴德的说法是定性扩大，反总理固然“好像”是五一六，揪军内一小撮也是五一六，把矛头指向新生革委会的也是五一六反革命分子。

吴德自己也说“‘五一六’定性的扩大，使‘五一六’问题大无边际，成为了全国性的问题。‘五一六’问题愈是严重扩大，所谓‘五一六’的反革命组织问题就愈是被搞得玄而又玄。最后，不仅在北京抓‘五一六’分子，而且在全国抓‘五一六’分子。这里固然打击了一些造反上来的坏人，但也使许许多多无辜的干部和群众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害和打击。”按照吴德先生的看法，不管用什么手段打击“造反上来的坏人”都是应该的，就算是用他在“批清”运动中间发明并实施的各种法西斯手段也在所不惜。因为要报复造反派群众对于当权派的冲击，要夺回造反派在革委会中间的代表地位，要永远地“根绝造反行为”，确实需要把一切对于当权派的不满都作为反革命处理，以儆效尤。这就不可能不处理非常多的人，总而言之，要达成这吴德那三个代表当权派的心愿，全国不抓出来上千万反革命分子，肯定是达不到他们的目的，而且，如果处分的人数太少，肯定对老百姓就缺乏威慑力量，所以对于吴德来说，抓反革命是越多越好，处理手段越残酷越好，毛泽东破口大骂的各种法西斯手段吴德们就是要用在逼供信中间去。

吴德作为五一六专案的高层负责人士，他非常清楚这个案子是彻头彻尾的冤案：“但到底有没有一个经过填表的严密的‘五一六’反革命组织，这却是清查过程中发生的疑案，恐怕是逼供信的产物。”“有一段时间，下边报上来的揭发数字天天往上涨。发现不对头了，哪有这么多人，如果是反革命组织怎么能弄到那么多人呢？张铁夫很怀疑，就向市委汇报。市委专门开了一次常委会，决定抓住一头，甩开一头。所谓抓住一头，就是抓住几个反革命案件，指在‘文化大革命’中间发生的几个重大案件和重要人物，查事件、查人物。所谓甩开一头，就是不要追什么组织、什么表，一般的，没有罪行的，就不要去折腾人家了。这以后就集中力量，查事件、查罪行，逐渐搞了核实、定案。”“我们组织查了几个事件，是涉及到全国性的东西。一个是围困中南海，几十万人安营扎寨；一个是火烧英国代办处；一个是午门大会，就是香港问题。这三个都是对着周总理的。在清查中发现他们有一句口号，叫做‘要揪一个永远健康以下的、保人保得最多的、揪出来让你吓一跳的人’，矛头所向清清楚楚。以后，我们在清查中提出了一个口号，就是‘谁反总理，谁就是反革命’。我们清查的这几个事件，都涉及到他们反总理。围困中南海，他们就是想把总理轰出来，戚本禹就逼周总理搬出中南海。然后，他们冲进去，抓刘少奇，再嫁祸周总理，他们是这么个阴谋。火烧英国代办处也是这样，总理负责外事嘛。午门大会也是这样。查了这三件事，基本上查清。”看一看吴德的推理逻辑，就非常奇妙，明明知道不存在五一六组织，但是还要抓，组织不存在了，就继续按照“事件”去抓，围困中南海明明是针对刘少奇的，但是被他说成是针对周总理的，而且目的定位成要把周总理赶出中南海。不过有一点倒是很清楚，吴德清理五一六反革命的目的，就是要针对多数响应中央号召起来造反的群众的，按照吴德这种奇妙的推理，清查“事实”都找那些参与人数特别多的事件，清查五一六运动就不可能不扩大化和涉及到数十万人了，如果把吴德说的这三件事都作为反革命事件对待，北京的造反派多数都要落入吴德的“反革命搜捕”大网了。

吴德对于清查五一六的成就，还是很满意的，因为很难查到五大学生领袖有什么反总理的罪行，恰恰相反，他们造反多数时候都是总理亲自支持和指导的，例如为蒯大富平反、清华批

判王光美大会都是总理亲自办理和批准的，但是吴德还是很有办法的人，真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随着这几个事件查罪行，查到罪行联系到这些头头，解决事件的发动者和幕后操纵者。还有周景方从学部带来的一批夺权的人，他们来后把持了市里的几个主要口，比如建筑。这些人都是支持造反的。还有参加工代会的那几个造反派头头。就是通过这次清查，把‘五大领袖’拿下来的。把‘五大领袖’搞下来，批判、查清了他们的罪行，然后把他们下放去劳动改造。张铁夫他们写了材料、写了报告。我传达了毛主席对这几个人区别对待的意思：谭厚兰是不行了；韩爱晶是蒯大富的军师；聂元梓的问题牵涉到林彪的问题，没有查清，放一放；王大宾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可以安排工作、给出路。粉碎‘四人帮’以后，北京市又把这些人的抓起来，批判了一下，批判的材料就是当年的那些，没有新的。”吴德领导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作用大得海了去了，小平同志拨乱反正期间，还继续运用他们当年清查时期的逼供信材料。

因为自己残害的老百姓数目太多，所以总是存在一个为自己开脱罪责的必要，大概也为了在政治上分化毛泽东和响应毛泽东号召起来造反的造反派，吴德轻飘飘把清查五一六的责任转嫁到毛泽东身上去了，他说清查五一六不仅有毛泽东的批示，而是还是江青和谢富治开了动员会的结果，似乎吴德先生多么真诚地执行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指示似的。根据吴德的回忆，周总理在落实毛泽东批示的时候，非常明确，就是针对外国语学院的情况提出三条具体意见。但吴德不是这样，毛泽东的批示本来是针对外国语学院、北师大等几个具体单位的，吴德先生接过这一“指示”之后，就进行广泛延伸，无限扩大，来落实自己的意愿，实现他的三大目标；等到毛泽东进行批评的时候，吴德先生又极端精明地大事化小了，甚至以“抓也抓不到”为依据，以没有事实为依据，拒绝制订具体的政策进行甄别落实，甚至连向上级写报告都免了。按照吴德自己的说法，他本人不是决策抓五一六分子的人，但是这个执行者是多么高明，真值得一切政客和阴谋家学习，以便提高“阳奉阴违”水平。对照一下周总理的执行方法与吴德先生执行方法的不同，可以看到吴德先生的高明和创意。

吴德对待毛泽东批评的手腕之高明，也是非同小可的：“我们商量说：抓‘五一六’扩大化了，我们只好认这个账。现在就按毛主席的批示精神，落实政策，统统把‘五一六’分子的帽子给他们去掉。北京市有关‘五一六’的情况，张铁夫很清楚，毛主席的批示落实，以及摘帽子等工作都是他来负责的。为此，李震提出要向上写个报告，他写了一个。我提出‘五一六’抓也抓不到，怎么写呀？而且毛主席已批评了，就不要再写什么报告了。李震还想向下发个指示，说明政策界限等。我也不同意。我说毛主席指定我们成立联合办公小组，周总理找我谈话时，我就提出过应该有个政策，周总理当时拿着事先准备好的延安肃反时的九条方针说，就按这个原则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办。现在还想搞个政策界限，这没有必要，而且很难，没有查出‘五一六’有什么证据，你怎么能够提得出区别政策来呢？后来报告没有报，指示也没有发。”吴德在为自己开脱的同时，还时刻不忘把责任推卸给别人，周总理也成为他推卸罪责的合理对象。

~~~~~

【拒绝遗忘】

最早洞悉文革真相的人

• 傅国涌 •

四十年前，当起自中南海的飓风卷地而来，浊浪排空，阴风怒号，多少老谋深算的权臣，多少武功显赫的元勋，多少权镇一方的封疆大吏，顷刻间都失去了正常的判断能力，他们乖乖地低下头颅，接受命运的安排，刘少奇留下的只是“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一句话。“文革”发

生之初，许多在权力舞台上沉浮多年的高官几乎都没有搞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不知道老毛要玩什么花样，更不必说挺身而出质疑这场涉及全民族命运的动乱，公开说出自己的态度。

迄今为止，我们已知在历史的大浪前面，说出了真话，直指皇帝新衣的只是几个可敬、可爱的小人物，他们或被囚，或被杀，付出了青春和生命的代价，但一部“文革”史因为有他们的存在，才有了一点人的气味。历史应该铭记这些人的名字——王容芬、刘文辉、遇罗克、陆洪恩……他们比那些高居庙堂之上、曾被老人家打入地狱的大人物远为重要，他们当年对“文革”的清醒和洞察才是我们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资源，他们身上显示的道德勇气也是人类文明赖以生生不息的根本动力。

◇ 王容芬透视红卫兵犹如纳粹运动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德语专业的四年级学生王容芬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简短的信，一针见血地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并郑重声明自己从即日起退出共青团组织。她曾参加天安门的“八一八”毛接见红卫兵，就是在这次红色海洋的集会上，林彪的讲话让这位学德语的学生想到的却是希特勒的讲话录音，她说两者简直没什么区别，从天安门广场回来，她强烈地感到“这个国家完了！这世界太肮脏，不能再活下去”。

她最终决定豁出去也要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她给中共中央、给共青团中央、给团校、给“伟大领袖”写信，贴上邮票寄出，然后买了四瓶敌敌畏喝下，她当时确是抱了必死的决心。可是等她醒来时，她已经躺在公安医院，接着被送往监狱。在关押了近十年后，她在一九七八年一月被判处无期徒刑，三年后被无罪释放。

为了那封信，她在狱中耗费了十三年的青春，进去时她是一个十九岁的花季少女，等到出来时她已经三十三岁，牢狱在她身上留下了永难磨灭的痕迹，她明显比实际年龄要老得多。她后来成了研究马克思·韦伯的专家，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她是幸运的，比起那些因为揭穿皇帝的新衣而遭枪杀的遇罗克们，她毕竟活下来了，见证了“文革”的潮起潮落，看到了造神运动的陨灭。

◇ 青年思想家刘文辉壮烈牺牲

当十九岁的王容芬说出“文革”不过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时，三十岁的上海青年右派刘文辉写下了洋洋万言的《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他直言不讳地指出：“文化大革命强奸民意，疯狂迫害民众，是全民大迫害”，“当权者人人自装，登天安门城楼掀起疯狂的红卫兵运动，宣扬穷兵黩武，高唱世界革命，控制报刊广播，操纵全国舆论，对内专政暴行，镇压知识份子，焚书坑儒推行愚民政策，比秦始皇更犹过人之处，人人唯唯诺诺不敢言，陷社会暗无天日，使神州大地百业俱毁，遍地饥饿赤身，穷山荒乡，白丁文盲。工人不干活，农民不种田，学生不读书，教书者牛棚劳役，形形色色流氓高喊革命口号。武斗伤民，残酷迫害，抄家捕人，惨无人道……”他呼吁“民主主义者在抗暴斗争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他和弟弟一起复写了十四份，以匿名信形式分别寄给北大、清华、复旦等十四所著名的大学？

一九五七年，二十岁的刘文辉因为给厂领导提整风意见而被打成右派，主动要求到艰苦的海岛上工作，一度想偷渡出境，被定为“现行反革命”，一九六六年春天被开除公职，押回上海老家监督管制，但他没有放弃独立思考和对民族命运的关切。如果说少女王容芬一眼看穿“文革”仅仅基于一种朴素的直觉，或者说是生活的常识，那么刘文辉是经过长期的理想思考，是有坚实的思想基础的，他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也通读过《鲁迅全集》，而且对胡适

的思想也不陌生，他曾起草一张大字报，让他弟弟乘夜张贴到上海交大的校园里，其中说：“我们提倡怀疑是反对武断，反对一切教条主义，一个自由独立的人和组织，对于一切思想，一切主义，必须要通过怀疑，而后可以相信，必须仔细考究过，然后可以相信，否则就是盲从。我们要提倡坚持独立思考，反对思想专制，反对精神奴隶。”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胡适思想对他的影响，这样清醒、理智的声音在一个举国疯狂的造神时代尤为难得。文革只能发生在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度，固然没有错。“文革”也只能发生在一个缺少独立思考的民族。刘文辉当然知道自己这样做意味着什么，他将为此献出生命，他对弟弟说，自己甘愿做当代的谭嗣同、中国的普罗米修斯。他的理由很简单，如果不去撞枪口，“全让毛泽东一人专制独裁，为所欲为，中国迟早会退到封建旧社会去！”“古今中外，反专制反独裁，必然有人以身许国，抛头颅、洒热血，唤起自难而软弱的民众奋起反抗，那末，今天就从我刘文辉开始吧！”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月黑风高之夜，刘文辉兄弟双双被捕。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刘文辉被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直到一九八一年，十四年后才宣告无罪。

◇ 音乐家陆洪恩死前慷慨直言

即使在黑暗、残酷的“文革”牢狱中，海外归来的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不愿苟全性命，临死前夕他慷慨直言二十五分钟：“我想活，但不愿这样行尸走肉般地活下去。‘不自由，毋宁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灾难。我不愿在暴虐、浩劫、灾难下苟且贪生。”“文革消灭了真诚、友谊、爱情、幸福、宁静、平安、希望。文革比秦始皇焚书坑儒有过之无不及，它几乎要想整遍大陆知识份子，几乎要斩断整个中华文化的生命链。”“如果社会主义就是这样残忍无比的模式，那么我宁做‘反革命’，宁做‘反社会主义分子’，不做专制独断、一味希望个人迷信的毛的‘顺民’！”四天后，他被枪决。当时同狱的年轻政治犯刘文忠多年后写下回忆录《风雨人生路》，记录了这位音乐家生前掷地有声的这番话。

◇ 老人家亲自批准枪杀遇罗克

遇罗克因《血统论》触及了特权社会的要害而获枪杀，他早在“文革”之初就对“文革”充满怀疑，认为“这么不正常”。他是那个时代少有的几个清醒而坚强的思想者之一。与遇罗克相比，刘文辉受到的关注实在是太少、太少了，他弟弟刘文忠二零零四年在澳门出版的《风雨人生路》，印量很少，鲜有人知。我印象中只是《开放》杂志曾经有人撰文介绍过刘文辉其人其事。（本刊于2005年五到十一月间长篇连载刘文忠《风雨人生路》一书，见zk0505d-zk0511f——编者）在祭奠“文革”四十周年时，不知还有多少人还会想到这个思想先烈，想到有人竟敢在“文革”之初冒杀头的危险也要说出真话。

四十年前翻滚的浊浪依然在历史中喘息，生者的头顶不是自由的蓝天，死者的亡灵未得到安慰，“文革”在四十年后仍是一个大大的禁区，欲纪念都不得，更不要说公开的反省和讨论。其中隐含的逻辑仿佛是不准公开言说的东西就是不存在的，强权迫使全民族遗忘“文革”，恰恰证明“文革”不应该被遗忘。我们拒绝遗忘，更拒绝有选择的遗忘，关注“文革”首先要关注刘文辉、遇罗克那样的冤死者和王容芬那样的幸存者，他们从一开始就洞穿了那场绵延不止十年的闹剧的奥秘。

我们更不能忘记，当遇罗克被枪杀后，高干子弟们曾经欢欣鼓舞，他们毫不隐晦地说“主席还是维护本阶级的利益的”。据说，遇罗克被枪毙的最后决定，就是公安部长谢富治上报老人家，他亲自批准枪决令的。

二〇〇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 原载《开放》2006年6月号

~~~~~

# 【研究动态】

## 昔日中国与今日中国之对谈

• 刘见林 •

今日中国发生的变化是如此之巨大，以至于当我们回首30多年前的那个中国时，常常会有一种恍然如梦的感觉，乃至于发出“这真的是同一个国家吗”的疑问，从而下意识地将过去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断裂开来，认为那时候的中国对现在的中国没有什么影响。但实际上，这种基于感性的认识是不客观的。正如著名的中国学家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和沈迈克在他们合著的新作《毛最后的革命》(Mao's Last Revolution,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和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合著, 哈佛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出版)中所说的: 欲理解今日中国的“行为方式”, 就必须设法了解文化大革命的经过。

麦克法夸尔和沈迈克这里所指的主要是中国人从文革延续至今的——甚至始自义和团时期或更早——那种易于偏激和狂热的特性。他们认为, 这种特性在今日中国人的内心深处仍然隐藏着。明了这一点, 也就不难了解今日中国发生的许多“奇行怪径”了。除此之外, 过去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之间还有一种更为积极的联系, 那就是: 正是文革时候无休无止的运动, 最终使得人们乱极生静, 对所谓革命日渐生厌, 从而为后来的改革打下基础, 包括《尼克松与毛泽东》(Nixon and Mao: The Week That Changed the World, 玛格丽特·麦克米兰(Margaret MacMillan)著, 兰登书屋2007年2月13日出版)一书所描述的那“改变了世界的一周”, 以及中国打开国门的先声——发生在文革期间的尼克松访华事件, 等等诸如此类的事件。

刚刚过去的一年是文革结束30周年, 而今年则是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 即尼克松访华35周年, 在这两大周年纪念活动期间分别推出的《毛最后的革命》和《尼克松和毛泽东》两本书, 正可让我们重温过去的那两段岁月, 了解昔日中国与今日中国之间的不同和内在联系性: 前者可促使我们反思民族狂热和偏激的危险性, 从而有可能让自己走向理性和健康; 而后者则可以在珍惜来之不易的今日中国的同时, 回首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 比如: 在那个狂热的特殊年代里, 毛何以会一改长期的想法, 转而做出那个“改变了世界”的决定? 要知道, 考虑到当时严峻的内外环境, 那是只有毛才有魄力和能力拍板的大决定啊!

《毛最后的革命》一书的作者麦克法夸尔和沈迈克(沈于瑞典隆德大学执教, 他2005年还在北京大学开过讲座)都是闻名世界的中国文革史专家。尤其是麦克法夸尔, 他是哈佛大学的著名教授, 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John King 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主任, 早些年便已著有权威性的三卷本大作《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并且曾和费正清一起主编了“剑桥中国史”系列之《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1966—1982》。此次他和沈迈克一起采用大量新出现的材料著成《毛最后的革命》, 再度深入探讨了文革的起源问题及其详细过程。

近年出现的一些关于毛泽东的作品, 比如毛泽东昔日的保健医生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 1994年)和旅英作家张戎夫妇的

《毛：不为人知的故事》(Mao: The Unknown Story, 2005年), 常常从一种类乎中国传统里的“野史”角度出发去刻画毛, 着重描述毛的私人生活和权力斗争, 对毛的正统形象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但麦沈二氏仍然坚持其理性分析传统, 维护毛的革命家形象, 而非仅仅如《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和《毛：不为人知的故事》里描述的权术家形象。

他们认为毛之所以发动文革的原因, 除了维护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外, 更出于其意识形态和革命理论——他认为共产主义革命受到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威胁, 因此他必须站出来恢复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纯洁性; 他是如此执着于要让他的国家从封建的过往中彻底解脱出来, 为此甚至不惜制造“天下大乱”, 以求大乱达到大治的目的——由此, 二十世纪最具悲剧性的一场动乱便爆发了。

文革所留给今日中国的最大遗产是“告别革命”, 过敏性地对诸如革命这样的“人类工程”产生深切的怀疑, 甚至痛恨。麦沈二氏在书里写道, 从此, 中国在邓小平的带领下, 不再执着于意识形态的纠缠, 转而采取一条以发展以往被极端鄙视的物质财富为目标的、边前进边探索的经验主义道路, 最终使得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直萦绕于每个中国知识分子——包括毛泽东——心头的强国梦成真。但由此产生的一个后遗症, 却是几乎所有的中国人, 包括执政集团, 包括知识界, 甚至包括普通市民, 对多数暴政, 甚至对民众运动产生了强烈的恐惧和抵触情绪, 从而使诸如“稳定压倒一切”这样的做法获得强大的民意支持。

文革反思中更应该回答的或者是以下这些问题: 为什么这场运动的规模会如此之大, 如此之狂热? 凭借毛一个人的力量果真能够操纵这场史无前例的动乱吗? 它是不是更与中国人狂热和偏激的政治文化有关? 不对这些问题进行明确的思考和回答, 中国在今后前进的路上可能会随时有触礁的危险。

发生于文革期间的、对今日中国的塑造更具影响力的事件, 应该是毛泽东在其去世前4年做出的, 同已经对抗了20多年的夙敌“美帝国”和解的决定。尼克松后来称他的这次短暂却令世界震惊的旅行是“改变世界的一周”。的确, 没有那次会面, 很难想象今日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 也许中美还处于敌对中, 也许中国还依然“独立自主”地闭关封锁着, 甚至也许和苏联在相互的核攻击中双双毁灭? 一切皆有可能发生。幸好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脍炙人口的《巴黎1919: 改变世界的6个月》(Paris 1919: Six Months That Changed the World)一书的作者玛格丽特·麦克米兰的新著《尼克松与毛泽东: 改变世界的一周》, “第一次完整记录了中美两国在经历了四分之一世纪的苦涩对抗之后如何坦诚相见、捐弃前嫌的历史。”(知名历史学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语)

在书中, 麦克米兰从当时的国际形势以及两国各自的国内环境出发, 解释中美两国1972年出人意料的和解。当时的中国因为“大跃进”政策已经造成了近3千万人的死亡, 之后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更是摧毁了一切既有的秩序, 使整个国家陷入疯狂和混乱, 在国际上陷入空前的孤立, 甚至与唯一的盟友苏联反目成仇。在1969年的夏天, 苏联外交官已经开始向美国试探, 假如苏联对中国发动包括核打击在内的战争, 美国将会如何反应。

当时的美国也同样问题丛生: 在外部环境上, 一方面是深陷越南战争泥潭, 另一方面, 在与苏联的冷战较量中战略优势已经转向对手; 在内部, 充斥了种族暴乱、反战运动以及各种各样的反文化思潮, 整个国家处于动荡中。在这个时候主打“中国牌”, 虽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但可使美国重新掌握主动, 包括迷惑国内批评者、让苏联感到恐慌、给盟国以信心, 以及便于尽快脱离越南泥潭, 等等。

麦克米兰指出，新近公开的材料表明，正是毛泽东本人做的这一决定，他果断驳回了一切反对和犹豫的意见，亲自指导了一切细节行动，包括批准美国乒乓球队1971年春的访华。的确，对于这样一个影响巨大的战略之举，对于这样一个与长期宣传的思想教条完全背道而驰的行动，也只有他这位“伟大舵手”才有魄力和能力决定。

□ 原载《华盛顿观察》周刊2007年第8期

~~~~~  
【荒唐年代】

“学代会”闹剧

• 周孜仁 •

文化大革命的核心动力当然是对毛泽东的宗教崇拜，因此革命闹到1968年，闹到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权力分配尘埃落定了，此后，某些既得利益者希图巩固权力并继续提升权力，少不了要处心积虑表忠心、作政治秀。“学代会”遂成了政治秀首选。

学代会，若干地方又称“积代会”，全名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另外还有叫“讲用会”的，具体解释则是“讲”“活学活用”毛思想经验大会。云南省省级规模的“学代会”一共开过两次：1969年、1970年各一次。1970年庐山会议，将毛思想捧为圣典的始作俑者林彪翻船，此类闹剧就再难为继了。

云南省第一次“学代会”筹备时期我尚在边疆供职，参会人数不详。二次开会我已调省级机关工作，情况便清楚些。首长——云南省党、政、军一把手谭甫仁中将明确声言要开一个万人大会，事实确实就开出了一个万人大会。当是时也，少长咸集，高人满座，气势蔚为大观。大学已普遍停了课，云南大学、昆明师范学院、昆明医学院，还包括昆明第一中学等多个学校校舍都成了大会代表驻地兼会场。大革命时代物质匮乏，全民营养不良，故而此类会议都有一道议程尤其鼓舞人心：全体代表放开肚量狂吃一顿云南美食：过桥米线。会议工作人员恭逢盛典，自然也不肯错失良机。那一回笔者正是在昆明师范学院大快朵颐的。是日走进校园，露天里一字儿摆开腾腾火炉。烈火烹油，红旗著锦，饕餮之声不绝于耳，让人想起梁山好汉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豪迈。

云南省的学代会两次都是十一月举行的。那么以前还有十个月大家干什么？层层选秀。逐级开会。先是生产队开，接着大队开，大队开完公社开，公社开完县上开，县上开完地区开……一直开向省城昆明。各级官员纷纷发动群众，深挖细找，务必推出典型并一炮走红之一——就如当今社会搞足球联赛搞选美赛搞卡拉OK大奖赛，不捧出几个大腕明星绝不罢休。各级新生红色政权：革委会大小官员绝对重视，绝对作为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来抓紧抓死一抓到底。个中道理很明显：只要能在全省大会捧出一两个政治明星，而且打响了，那么，不仅明星本人可以出名且实惠，更重要的是，发现并推出此明星的领导必然也会因政治眼光敏锐独到而升迁有望。

关于“典型”本人的实惠，这儿可略作解释。比如由下乡知青而学代会先进典型者，很快可入党、可提干、继而至于回城云云。工人代表不存在回城问题，一登会门，自然也可入党，可“以工代干”或直接提干、继而至于升官者。农民情况和上述二者大同小异。试举一例：红河州女典型丁某，举为省代表年方十八，一副伶牙俐齿生猛难当。事迹亮点之一，就是那一年家乡发地震，丁从外地急急赶回，首先不救人，而是心急火燎去废墟中把收音机扒将出来——据她的“讲用报告”说，她是想马上听北京的声音，让毛主席指挥战斗——仅此一端，她不仅当了代表，而且很快又当了X委常委。顺便说一句，民间对于她的事迹多有微词，说她见物不

见人，救物不救人，皆因财迷心窍：那时全民生活水平低下，收音机很值钱的。还有一例：也是女典型，玉溪农妇Z某，新婚初嫁，正遇伟大领袖号召“备战、备荒”“要准备打仗”。新妇本是俭省人，在婆家做饭浆洗精打细算——前面说了，全社会物质匮乏，全民营养不良，为预防吃了上顿没下顿，新妇每天做饭淘米总要悄悄抓米一把私匿他处，久而久之竟攒下了“备荒粮”数十斤——此事不知如何被省委领导发现，马上号召云南全民学习，开展“一把米”活动，用实际行动落实“最高指示”。Z某一旦成学毛著典型——当时任何成果理论上均为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很快和J一样被提至省级机关，当了XX 委常委——也需补充一句，关于此举，省委办公厅一个同事就颇多歧议，还在新妇大受表彰之会场，他就十分悻悻地私下对我说了：不过就了几十斤米么，就搞个常委当当。我已攒了几十斤粮票呢，怎不见谁来提拔我？

必须说明，绝大多数工农代表绝对忠诚老实，他们当代表上省城完全是为人作嫁。先进典型这个头衔到底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或者害处他们浑然不知。更有甚者，干脆偏偏就不吃这一套，现成先进放在那儿让他当他也不愿当——我在采访中就遇到过此类不进油盐的“政治傻瓜”。

那回我是被派去陇川县抓典型，行前领导有招呼在先，说那儿北京知青多，一定要我深挖细找，务必从中抓出一两个明星以壮知青胆气。我去了。首先找农场“知青办”调阅书面材料，接着按图索骥，将一大堆积极份子悉数请来座谈，接着要他们将各自先进思想革命事迹从实写来——结果大失所望。任你巧舌如簧，百般煽动，他们就是死活不动笔，后来一个个索性借故开溜——只有两人留了下来，写了：一个叫葛云彦，北京某剧团职员之子；一个叫马艳玲，记不起出身如何，反正也是个平民闺秀就是了。这二人规规矩矩写了，总结材料经我润色加工，报上去，结果被评了县级先进，不久，五一大节，还被选派昆明观礼，后来还真调回了北京。至于那几个“傻冒”为何不写？后来查了，原来全是高干子女，反正等到爹妈一解放，他们也就跟着荣归京城，稀罕你土得掉碴的云南佬来恩典吗？他们压根儿就不想浪费表情！还有更为精彩的抗拒先进的故事，留待后面再说。

现在还说第一次“学代会”。

筹备第一次“学代会”那时我还在保山地区宣传组供职。为了抓好典型，专区革委会事前就精心组织了写作班子。机关干部、小学教师、中学教师，凡听说有点儿写作能力的，通通调革委会集中试用。保山蛮荒野地，笔杆子紧缺，我好不容易才在专区医院物色了一个医生——名唤廉蔼明，上海支边人员——跟我跑几天，好人一个，就是写作水平差强人意，只好换上一个替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生胡乎亨。写作水平自然很高了，皆因57年领了右派衔，一般人对他们敬而远之。俗话说：河里无鱼虾也贵。为了完成任务，我也就顾不得右派左派了，带他一齐奔了边疆。当时批判“边疆特殊论”“民族落后论”，德宏自治州被撤消，保山专区直辖十个县一个镇，宣传组领导遂定计分兵两路，军代表及另一位干部走西路，我和胡则走东路，负责潞西、畹町、瑞丽、陇川诸县。指导思想，则务必求新、求奇、求特。

边疆民风古朴，学习毛著尤其虔诚。试举一例：瑞丽县水电工人段庆林一人独守山顶压力前池，数年一日，就凭一本小学生字典，公然把毛泽东雄文四卷悉数通读，而且还歪歪扭扭写了几大本笔记。（按：当时边疆小县多无电网，各县城都由小水电供电。电站压力前池蓄水一日，到了晚间即可供电三、四小时。段兄就是被电站领导派去山头驻守水池并负责管理二十多公里绕山沟渠的）我记得他日记中最为精彩的段落如下：某夜发电结束，段正在梦中高卧，突然风雨大作雷电交加。大梦惊醒，段首先想到如此风雨万一冲塌了水渠沟帮，蓄水不成，明日何能发电？发电不成，电灯不亮，全县百姓如何看得主席著作？收音机无电不响，如何听得主席声音？想到此节，他已睡意全无，翻身起床，匆匆忙忙便向门外奔去。就在此时，最要命的事情发生了：远远黑暗之中，飒飒密雨之下，庞然大物横卧路上，一对铜铃大眼灼灼放明，一张血

盆大口喘喘有声——是豹子！段遂裹足，并马上开展思想斗争，他立即“想起了毛主席的伟大教导”——段同志的日记如是写——“‘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日记写道，一想到此，他便浑身充满无穷力量，于是大摇大摆走将过去。“豹子看见我耀武扬威的样子”——我记得日记如是写——“便夹着尾巴跑掉了”。

这段日记让人忍俊不禁，我遂问：

“你看见的明明是个真正的豹子，你怎么会想起纸老虎呢？”

段憨厚一笑，回答真诚而肯定：“当时我想到的就是这段语录。”

确实没有必要解释。那个时代本来就够荒唐，越荒唐越能表现一个人的忠诚。我们也就照原样写了——搞定。报上去：完成一个。

接下来还有更奇的。

上面说了，水电站段师傅对工作任劳任怨，一门心思就要保证供电，别弄得黑灯瞎火大家学不成雄文四卷。他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种人、尤其是还有一种先进典型学毛选时候压根儿就不需要电灯呢——因为他们是瞎子。这类典型学习毛著完全是跟着别人来，外师听觉，中得心源，继而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最终修成正果。陇川县“一号种子”梅迪就是其中之一。

梅迪，陇川县朋生生产队社员，景颇族老太太。为了写出有份量的材料，我在她家里住了整整一周。我必须老老实实承认，景颇族人民的热情好客、他们的诚挚厚道、勤劳朴实让人至今感念于怀。我强调这一点正是要说明，让这样一个憨厚朴直的民族参与这场闹剧是多么荒唐甚至残酷。我在梅家“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周，当然知道她压根儿说汉话都非常困难。说汉话如此困难却能用汉语熟练背诵毛语录，甚至能把毛泽东的光辉著作“老三篇”、甚至中共九大刚刚通过的所谓“新党章”全文倒背如流，使我再看其他典型简直就有点“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感觉。正因为如此，公社就让她走村串寨，像表演特异功能一样到处表演背书功夫。有趣的是，同样一篇文章，她的诵文一忽儿昆明话，另一段又来四川话，再一段又来北京土话——后来问清楚了，她的本领全是从来此插队的知青那儿学来。跟着昆明知青就学昆明话，跟着北京知青就学北京话，跟着四川知青就学四川话。至于雄文所言何事，她自然不甚了了，甚至不知所云。

一个景颇族老太太，能做到如此，不管懂不懂伟大领袖所教何物，仅凭这等惊人记忆力，你就不能不服她。这自然就应该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种人自然应该先进，应该报上去，应该进省城。

中国形容人之走运，有一句话叫“走路遇到财神，睡觉梦见周公”。那段时间我就有点那个意思，走到哪儿都遇到激动人心的高人。刚刚被梅迪感动着，很快我又遇到了另一个瞎子，而且也是景颇族，汉文名何米娃，中年男子，潞西县遮放区拱瓦公社社员。他的背书功夫虽不如梅迪，但其余事迹却有过之而无不及。何的眼睛是在大跃进期间修水库炸石头给炸瞎的。眼被炸瞎而能继续坚持学习革命领袖伟大著作这本身就很了不起。所以一接触到他我马上就想送他一个称号：“中国的保尔·柯察金”。这个称号自以为很贴切而且非常浪漫，但立即想到，当时中苏之间剑拔弩张，势同水火，这名号大有修正主义之嫌，遂很快打消了邪念，文章最后定名为“景颇山上的雄鹰”之类什么的。我在拱瓦山和英雄“三同”半月，接着便带着文章踌躇满志直奔昆明去了。

昆明那时已秀才云集。全省各地各州的写作班子全都开进省委一号大院安营扎寨。具体地

点是原省委幼儿园。大革命时期，大学尚且停办，幼儿园当然不能幸免。原来小孩们的午睡室游戏室全成了笔杆子的寝室兼接待室创作室。全省的秀才“枪手”们一个个在此摩拳擦掌，挑灯夜战，大有“人人握灵蛇之珠，家家抱荆山之玉”、金殿大比之概。

没承想那年月，原来英雄辈出，天外有天山外有山。与兄弟专州相比，我们很快发现保山推出那些“新奇特”不过是些“小儿科”而已。开始，保山地区革委领队、军代表高西明明确把何米娃定为“一号种子”，自始至终亲自督办。可到了省城一看，别说瞎子，聋子、哑巴、缺胳膊少腿的各地先就选送了一大堆，而且各有奇招，谁也不输于谁。就说瞎子吧，我们有人去刺探过，光光一个红河州，瞎子典型就坐了两桌。有几位原来还是算命先生，口齿极端利索，只用把算命言子稍加变体，马上就成了“闪光语言”。讲用会上的手势也基本沿用算命经典动作：食指、无名指和小指曲如兰花，而大指中指则掐个不停，口中念念有词曰：“私字不断，必有后患；私字不倒，江山难保”云——那时毛泽东最著名的最高指示就是“要斗私批修”。更奇的是，各地各州上报的材料甚至题目都“英雄所见略同”，如为瞎子，题目均为：《没有双眼，也要读毛主席的书》；聋子则为：《没有双耳，也要听毛主席的话》，瘸腿：“没有双脚，也要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飞奔！”

当时负责总揽学代会材料全局的军代表、省革委政工组新闻组组长叫李长明，一看这般景况，不免大为光火，于是发下话来。其意概为：健康人就学不好毛泽东思想么？接着下令残疾选手一律不得出线——至此，秀才们在昆明拼杀多日，最后各败俱伤，无功而返。

与此同时发生的是，此次学代会有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典型竟然兵不血刃，轻而易举便拔了头筹。一个是玉溪烟厂（当为今天的红塔集团）代表李莉，7岁。一个是江城县傣族老太太（傣语叫老咪涛），名字已不详，97岁。一老一小被记者们弄一块儿拍下一张“老少配”：年龄悬殊高达九十岁的俩代表共同学习伟大领袖著作合影相，还上了《人民画报》，直教所有笔杆子艳羡不置。

此结果为云南省的第二次学代会埋下了伏笔。

所谓伏笔，就是说，一年后筹备全省盛会时节，大伙儿心里就明白了：要用残疾人出风头万万不可。而代表年龄却大有潜力可挖。自然，要找出比“老咪涛”年龄更大者，空间已经很小，而要小于李莉，余地则大大的有。各地州上报的小代表之最，仅三岁有余，其荒唐自然不亚于上一届瞎子称雄，最后理所当然又克了一通。最后只在诸多老少典型中保留一例，并且上了讲台参加表演：弥渡县还是什么县（记不清了）的祖孙三代同堂讲用。“三代红”这个创意绝对一流，只是正式表演时出了点洋相：小娃娃在台上一一直坐立不安。动得太厉害，工作人员觉得不管不行了，这才悄悄上去一问：原来小娃娃没见过大世面，一上台就尿急，那当儿已忍无可忍——大会只好休息片刻。

必须补充说明，第一次学代会笔者虽无上佳表现，但工作之勤恳仍莫名其妙被相关首长看中，也就莫名其妙调到首长那儿当起了秘书。第二次学代会召开，我就已不是以代表地区写手名义参与竞争，而是以秘书身份前往调研了。这就有了可能了解到一些内部情况。这些内部情况同样饶有兴趣，不记可惜。

印象很深的一件，就是前面说过的、抗拒先进、压根儿就不想在此荒唐闹剧中浪费表情的故事。故事主人公名叫刘维路。

刘维路，瑞丽县民族贸易公司经理。一说经理，你准以为很风光的差事，想到油头粉面西装革履之类。刘维路可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瑞丽县真正是地处西南边陲，由昆明下去当时还

需要整整六天车程。那时的瑞丽县之荒僻冷落就和内地的普通乡镇等同，可用“一条马路走通头，七个机关八栋楼”。民贸公司不过就是其中一座普普通通的两层楼房而已。刘路一望而灰头土脸，用“萎琐”二字形容绝不过分，但来历却十分了得：老红军。而且是毛泽东名著“老三篇”之一：《为人民服务》主角张思德的生前战友！仅此一点显赫就足以把你猛吓一跳。可惜老革命文化太低，人又太过厚道，绝对无意官场行走，所以虽有如此这般历史，解放初一旦转业来此，就只能数十年如一日，在小小边疆县民贸公司作一个小小的“弼马温”。

刘维路默默无闻埋没多年，不知为何到筹备二届全省学代会时突然被人慧眼识宝，这很像马王堆汉墓或秦皇陵兵马俑沉睡多年、一朝重见天日一般，顿时在业内引起巨大轰动：如此重量级人物——完全可以想象，如果延安当年，窑洞垮塌时压死的不是张思德，那么“三个光辉形象”中的一位（另外两位是白求恩和老愚公）完全就可能被刘维路取而代之——不树为省级典型而何？

为了隆重推出如此重大成果，瑞丽县自然派出豪华阵容撰写讲用材料。主笔者为现云南省文联副主席、当年的四川大学中文系高材生、县中语文教师刘鸿喻。为了完成如此光荣、重大的历史任务，刘老师昼夜跟踪老红军，甚至不惜给他铺床叠被、打洗脸水洗脚水。如此谦恭卑微甚而至于低三下四，皆为一个目的，希望老红军能配合默契，把他灵魂深处最为闪光的亮点悉数抖擻而出，好让秀才妙笔生花。

可惜事与愿违，不管刘老师如何低三下四，刘红军就是不予配合，不但不配合，而且对已经成文的“动人事迹”也经常“翻供”，搞得老师叫苦不迭又无可奈何。举例说明：原文已经写好老红军学毛著亮点事迹之一是：他老婆有一回闹情绪，嫌工资低了，拒绝上班。后来，老红军就举办“家庭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老两口“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立竿见影”——刘老师所撰典型材料如是说——重点学习毛主席光辉著作《为人民服务》，对照张思德的崇高品质，比比自己所作所为，老婆子茅塞顿开，思想问题迎刃而解，高高兴兴上班去也。原稿送审，领导认为还不够生动具体，要刘老师继续找刘红军“挖思想”“查亮点”，尤其注意挖掘“闪光语言”、说清家庭学习班上他和老婆到底有过何种思想交锋？特别注意其在对照张思德光辉形象、做老婆思想工作让其上班，此过程中有何生动、新鲜之细节云。本来，事情做到前面那一步，刘老师可说已费尽了移山心力。领导还不行，那就只好又找红军配合吧。谁知老红军早已被这套作派折腾得忍无可忍，几句话就把老师打懵了：红军说，我何时和老婆共同学习过《为人民服务》？老师问：那你对她说些什么呢？红军答：我就告诉她，我工资这么高，还不够你花吗？闹什么情绪，你给老子上班去吧！她这就去了。

让刘老师头疼的还有一例：原稿写过这样一事，大热天，公司阳沟臭气熏天，严重影响商店生意，老红军一人便亲自操锄将污泥浊水很快掏了个干干净净。文章叙述该过程时，当然少不了张思德光辉形象的鼓舞激励之类。原稿送审，同样因为领导觉得不够生动具体，要刘老师继续找刘红军“挖思想”“查亮点”，说清楚掏沟时到底有过何种思想斗争？尤其是如何对照张思德，将掏沟行动进行到底。领导说不行，只好硬着头皮又去请求配合。这一回老红军照样不赏脸，还是一句话把老师搞定：阳沟那么臭，我哪有时间去想张思德？你问我想什么？我就想咋个早点把渣渣掏干净！

让刘老师遭受毁灭性打击的是老红军最后、在最要命的关键事迹上翻了“供”。

事情经过和上面大同小异。这个不够生动具体的情节是，领导要求刘老师重点挖掘刘红军在延安现场亲自聆听伟大领袖毛主席做《为人民服务》报告时，心情是如何之激动云。这一回，红军的回答让刘老师的经营数月的典型材料整个儿遭遇了灭顶之灾。事实上，云南省第二次学代会确实让刘维路上了主席台，但他的先进事迹材料的确平平淡淡，无法引起轰动，最后只好

彻底放弃。老红军对此一问题的回答是这样的：毛主席做报告那天我去是去了，听是听了，可我只听了一会儿就走了。你问为什么？我觉得一点也不好听。

要说二次学代会的奇人奇事，当然还有别的。比如死人。有一来自昭通山区的农业学大寨先进分子，一看昆明城“寨子”这么巨大，滇池“围海造田”工程如此宏伟，太激动，觉得“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以为自己成绩藐小，实在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党，这就疯了。他住在云南大学，出门就看见翠湖。冬天，翠湖波平如镜——事后精神医生分析，说他肯定误认为是浩浩广场了，于是产生英雄感——于是像大无畏的革命战士一般操着正步直行而去，于是，死了。还有一个住在昆明医学院的代表，开大会时错喊一句口号，虽然谁也没有注意，可他觉得自己犯了弥天大罪，日日就独躲私处，跪在领袖像下悔罪——即使这样，他仍觉得不足以补罪于万一，只好一死以证明自己对领袖之忠诚不二——等他从医学院的楼头跳将下来，死了，会议组织大家开展分析，这才有人想起这些天该代表确实行动怪异，又想起他好像确在某天大会中喊错了口号（虽然谁都没有注意到），又想起他确是把“打倒刘少奇”喊成了“打倒毛主席”……

著名共产主义记者安娜·路易丝·斯特朗在她的回忆录《斯大林时代》“序言”中有一段名言，其意概云：一个伟大的革命事业，每前进一步，都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除了有许多英雄战死疆场，还得有许多人冤枉而死。几十年过去了，如果可以把学代会上上述殉道者们列入伟大革命事业的枉死者名单之中，从而让我们得到一丝儿毫无实际意义的宽慰，那么在当时，这些莫名其妙的死事（据说“学代会”的死者还不止于这两位）确把会务人员搞得非常尴尬。因为，正是这些冤魂给“不是小好”而且“越来越好”的革命“大好形势”抹了黑——为了消弥影响，理所当然就要严密封锁消息，让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正因为此，在撰写本文的时候，我想了很久，而且求证过许多当年的亲历者，谁都无法回忆起这些死者的名字，并将他们记录下来。

这个荒唐的故事，只能这样遗憾地煞尾了。

~~~~~

## 【千秋功罪】

为了铭记、埋葬和解魅——悼念王光美

·徐时利·

随着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女士于10月13日凌晨在北京逝世，中共第一代核心人物所剩无几的配偶中又凋零了其中最重要的一位。这不能不令人感叹，斗转星移，人世代谢，“更能经几番风雨”？

王光美作为共产党第二号大人物刘少奇的配偶，这种特殊的身分和地位，使她时而上天，时而入地，暴荣暴辱，大起大落。

王光美女士虽然生前备受敌手的凌辱，但是晚年终享平安，得尽天年，寿终正寝，与江青悬梁自尽、叶群殒身温都尔汗相比，真是幸事。

在告别人世之际，王光美女士可能感到欣慰：老公刘少奇得到平反，恢复了名誉，头像堂而皇之地上了百元大钞，硬是再次和当初把她老公打成“叛徒、内奸、工贼”的毛泽东——“伟

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平起平坐……

在告别人世之际，王光美女士也有可能感到扬眉吐气：尽管自己经历了十二年的牢狱之灾，但是可庆幸的是，实行一党专政的中国共产党，唯独在“秦城监狱”实行“轮流坐庄”制，就在她还在狱室中苦苦煎熬的时候，毛泽东的配偶江青女士已经提前进场，赶紧把她替换出去。而且，在“公审”江青的时候，她安坐旁听席上，冷眼注视坐在被告席上的江青发作歇斯底里，她心中很可能在品味着“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这句格言的隽永含义……

## （一）

王光美女士去世了，我们悼念她，是为了铭记凝聚在她身上的那段令人痛心的历史，铭记她在那场空前暴露人性丑恶的“浩劫”中所遭受的侮辱和损害。

众所周知，“文革”刚开始的时候，是毛泽东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把她的老公、堂堂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打入十八层地狱。毛泽东亲手发射的《炮打司令部》那一炮非同一般——炮声一响，带给刘少奇的是一纸死亡判决书。曾经因为老公而风光无限过的王光美女士，随着老公的倒台也跌入地狱。在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中，刘少奇、王光美夫妇没有最起码的人格和尊严，任何人都可以辱骂他们，作践他们。他们被无限丑化：不堪入目的漫画，无中生有的大字报，打了“叉子”的名字，还有贴得满街都是的大标语“油炸刘少狗！尿熬王光丑！”

但是，所有这些，都不及毛泽东的配偶、刚刚荣任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的江青给她的一顶帽子“战略情报特务”更具杀伤力——为了这顶帽子，王光美女士差点儿被枪毙！

在“文革”中，王光美女士经受了难以记述的凌辱和苦难。在中共党史上，刘、王夫妇的遭遇应当成为标志性的事件，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专制极权达到了难以想象的野蛮和荒谬程度，表现出的丑恶和残暴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中所仅见，使中华民族在全世界人民面前蒙羞。

现在人们都非常清楚：王光美女士所经受的苦难，不是她个人的苦难，也不是他们一个家庭的悲剧。可悲的是，亿万无辜的中国百姓被这场“政治海啸”卷入其中，反复扫荡，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但是，事到如今，刘少奇、王光美一家倒是彻底平反了，享有前国家主席级别应该享有的余荫。而那些无辜受害的平民百姓呢——比如“文革”一开始，在“流血的红八月”被“红卫兵”打死那些的校长、老师们呢？——据“文革”结束后公开披露的统计数字，1966年8月至9月的40天里，红卫兵仅在北京一地即打死1772人，其中有13名是校长。这些死难者们的家属呢？又有几家被认真对待了？遍地苦主还不是在那里默默地自生自灭吗？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悼念王光美女士，就是为了铭记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只有充满私利的头脑，才会鼓吹“淡化文革”。如果“文革”真的在某种利益的驱动下被“淡化”了，那将是为中华民族留下可怕的“癌症病灶”，扩散开来后患无穷，谁鼓吹“淡化文革”，谁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 （二）

王光美女士去世了，我们悼念她，是为了埋葬她在专制体制中所扮演的那种历史角色。刘少奇的“二号地位”使王光美生活在共产党的权力核心，她不仅仅是中共历史的见证人，也是中共多种密谋的参与者和知情人。

共产党内的斗争向来是你死我活的，“十次路线斗争”的历史表明，党内的残酷厮杀，真像

他们自己所表述的那样：“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党内斗争中，由于上午还是“战友”、下午就成了“敌人”的事例屡屡发生。所以，那些“高层领导人”都心知肚明，党内没有什么可以让他们推心置腹的“战友”。而利益“最大化”的一致性注定了“枕边人”才是自己的“铁杆”。因而“政治夫妻店”竞相开张，夫人们以“秘书”的名份充当耳目，频频往军机处行走，公然参掌机要，运筹帷幄，请看：

江青，先是毛泽东的“生活秘书”，文革伊始，荣任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权力无限；叶群，多年来是“林彪办公室主任”，上呈林彪的军中大事皆需首先向她禀报；王光美，婚后不久，便是刘少奇的“机要秘书”，机密文件的收发全部经她操办。

平心而论，江青、叶群、王光美等人担当的这种历史角色，更多是由共产党的专制制度所派定的，她们的老公们是主谋，她们自己选择余地较少。越是到党内斗争的白热化时期，党的领导人越需要他们各自的“内掌柜”出场，“最大化”地发挥作用，这也是一种“患难之中见真情”——信得过，因为危急之中，顾不得像平时那样披挂“大公无私”的伪装了。比如：

以我们今天的后见之明，我们认识到，“文革”之前若干年，毛泽东、刘少奇之间的矛盾已经日趋尖锐。在毛、刘较量的关键时刻，1963年11月，王光美受刘少奇派遣，化名“董朴”，采用刘少奇熟悉的“白区”工作方式，神神秘秘，来到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扎根串联”，炮制出一份指导全国以残酷批斗农村基层干部来开展“四清”运动的文件“桃园经验”。1964年6至8月间，刘少奇带着王光美从北方走到南方，由刘少奇坐镇，王光美在十四个省市作巡回报告。返回北京后，8月1日，刘少奇再次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会议，由王光美向中央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负责干部作了一个大型报告。在这些报告会上，刘少奇在前后发言中则是一口一个“光美”，据有待证实的“揭发材料”，刘少奇还说了“她的水平比我高”这样的话。1964年8月19日，刘少奇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拟了批语，并直接写信给毛泽东，要求把“桃园经验”作为“四清”样板批发给全国。9月1日，“桃园经验”便作为一个“有普遍意义”的样板，由中共中央正式行文介绍到全国各级党政机关，与中央文件前、后《十条》并行，指导全国“四清”运动。

四十多年后，对“桃园经验”的政治恶劣性和残暴性似乎已经不存在争议，“桃园经验”形成过程中“夫人干政”的范式更为人所诟病，本文不拟讨论。笔者想指出的是，“桃园经验”加深了毛、刘之间的对立，加速了“文革”的到来，也加剧了这场“空前浩劫”的破坏性。“桃园经验”出笼之后，毛、刘之间的一场恶斗必不可免。

据曾经是中央文革成员的王力先生的《王力反思录》披露，果然，为王光美到处作“桃园经验”报告一事，江青专门跑到毛泽东那里哭诉：“斯大林死了之后赫鲁晓夫才作秘密报告；现在你还没死，人家就作公开报告了”！

在专制政体下，最高领导人可以为所欲为，不必遵循任何规章制度。于是，毛泽东迅速做出反击，由林彪出面，抬出江青，由她主持全军文艺座谈会，并且，也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下发文件，这就是1966年4月10日下发全国的中共中央批发的正式文件《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就是这样，你为你太太炮制一份中共中央文件，我也为我太太炮制一份中共中央文件。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号领导人和第二号领导人，他们在争权夺利的私心驱动下，视国事如儿戏。

由于毛泽东的奋力托举，使当年上海滩的三流演员江青此番在“文革”中挑大梁，担任主角。于是，江青洋洋得意，咯噔咯噔地迈着大步，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此后不久，毛泽东更是直接任命江青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和政治局委员，使江青踏上了权力的顶峰，对全

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吆三喝四。

阴谋家康生长期追随毛泽东，在“文革”期间担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不早不晚，他的夫人曹轶欧也出来参战，1966年8月13日，曹轶欧出面向中共中央写信，揭发王光美的所谓“问题”，并攻击刘少奇包庇王光美。

中国有一句歧视女性的俗话：“三个女人一台戏”。“文革”一开始，江青、王光美、曹轶欧三个女人一齐参战，打得你死我活，成为“文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得这句颇有缺陷的俗话不幸成真。

夫人干政，拨弄是非，更加激化了她们原本就乌眼鸡似的、恨不能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的老公们之间的矛盾。毛、刘之争引发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整个中国推进灾难的深渊，这正是“老公恶斗，婆娘参战，百姓遭殃”这种政治模式运作的结果。如今四十年过去了，中国依旧疮痍未复。我们悼念王光美女士，就是为了埋葬她——还有江青、叶群、曹轶欧等人——在专制体制中所扮演的那种历史角色。

在今天的中国官场，“贪内助”多如牛毛，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的一大特色。正如媒体所说的，“每个贪官身后都有一位贪内助”，她们仰仗丈夫的权力，插手丈夫管辖领域内的事务，指手划脚，安插亲信，公然收受贿赂，成为中国官场的一大痼疾，且有“病入膏肓，疾不可为”之势。追根溯源，这正是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所创立的“夫人干政”的模式今天依旧在继续运作的结果。从这种意义说，毛泽东、刘少奇都是导致这一模式的“始作俑者”。因此，我们悼念王光美女士，在安葬她的同时埋葬她在专制体制中所扮演的那种历史角色，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 （三）

王光美女士去世了，我们悼念她，是为了通过分析她的那些被众多网民称为“亲毛秀”的、有虚假矫情之嫌的谜团，从而让我们自己解魅。

众所周知，毛泽东发动“文革”，不但将刘少奇、王光美置于死地，也使他们的子女也历尽劫难。1980年11月，刘少奇与王光美的儿子、当时正在北京师范学院就读的刘源——今天的解放军中将——有一段充满了正义的激情的讲话，对这个家庭的不幸遭遇作了淋漓尽致的描述和愤怒的控诉：

这十几年，我与全国人民共同经历了一场可怕的大灾难。我的家中死了四个，六个进监狱。我自己，起码可以说不比任何人受的苦再少了。我甚至都不敢完完整整地回顾自己的经历，那太令人不寒而栗了。但是，那一幕幕，一场场景色都深刻在我心里，不时地漂现脑际，不让我安宁，我想任何一个曾无言地与父母生离死别的孩子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我走过唾沫和侮辱的狭道，曾几次被抛入牢房，在那里埋葬青春；在饿得发疯的日子我像孤儿一样生活过，像狼一样憎恨世界。那些年，我咬着牙活下来。谁曾目睹过父母在侮辱的刑场上，在拳打脚踢中诀别？谁曾亲眼见过有人往才九岁的小妹妹嘴里塞点着的鞭炮？大家能想象我心里的滋味。我咬着牙，一声没吭。从十几岁起，我就在鞭子下劳改，在镣铐的紧锁中淌着鲜血；多少年，在几千个日日夜夜里，每一小时我的心都在流着血和泪，每时每刻都忍受着非人的待遇和压力。我紧紧地咬着牙，不使自己发疯。为什么？就是为了看到真理战胜邪恶的一天。……今天，回顾以往的苦难，我决不允许让别人，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再经历这样的痛苦！我必须站起来为人民说话。为了避免灾难重演，就必须铲除产生封建法西斯的土壤，实现民主，不管有多难，路有多长，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就去争取民主。”（转引自《开拓——北大学运文选》，第352—353页，香港田园书局，1990年）

这段讲话的历史背景是，1980年11月，北京各高等院校的大学生们展开了一场具有民主色彩的的活动——竞选小小的区人民代表（当然，竞选活动最终全部被压制下去）。刘少奇的儿子、当时在北京师范学院就读的刘源也主动参选。上面引述的这段文字，就是他在一次答辩会上讲到自己参选的个人动机的讲话。

今天看这篇讲话，可以感觉到这位年轻学子说的确实是真心话，而且这样充满激情的宣言未必违背母亲王光美当时的心意。因为据多种媒体报导，在一九八〇年刘少奇平反追悼会的悼词中，原先有“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刘少奇”之类的句子。王光美女士坚决反对，声称必须删去这句话，否则，“作为党员，服从组织上的决定；但作为家属，不参加追悼会。”——刘少奇健在夫人不参加刘少奇的追悼会，这样的“追悼会”成何体统？最后是中央妥协，不提“亲密战友”，王光美这才出现在刘少奇的追悼会上……（黄河清：《王光美大处不含糊！》）

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王光美女士的表现越来越远离她一九八〇年坚持删除悼词中“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刘少奇”字句的立场；无独有偶，她的儿子刘源的调子和他当初的竞选演说相比也越来越走样。王光美女士到处歌颂毛泽东，给人们留下难解之谜……

例如，一九八三年，王光美和刘源母子专程去韶山瞻仰毛泽东故居。在那里，母子二人大讲中共“九大”刘少奇被迫害致死之后、毛泽东对王光美“刀下留人”的恩德。刘源说：“毛主席确实是一个伟人，是中国共产党了不起的领袖。”王光美更以“学生”的名义在留言簿上题词：

深切缅怀毛主席

学生王光美

1983年11月28日

王光美女士的“学生”说还见于其它场合。比如，王光美曾经对新凤霞说：“凤霞，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与王光美女士相比，新凤霞出身贫寒，没有“学历”。但她为人真诚，虽然身为演员，在舞台上扮演过各种各样的人物，但是在生活中从来不做“作戏”。对“好学生”说，她嗤之以鼻，事后对人说：“她男人都被毛整死了，她还说这样的话，你说坏不坏？”

二〇〇四年一个夏日的傍晚，由王光美召集，刘源负责联络，毛、刘两家的三代人，参加了这次聚会，聚会之后，毛家后人、毛泽东的外孙女孔东梅撰文介绍这次聚会的情景。文章没有介绍披露王光美女士在聚会中讲了些什么，但是记述了刘源将军望着“其情融融”的两家人，便想起了苏轼的千古名句“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刘源所引的名句出自苏轼的词《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轼此词是在谈哲理，他在风雨之后悟到：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风风雨雨乃寻常之事。人生在世，对已经过去的风雨，不须介怀……

刘源先生引用苏轼此词，非常符合当前中共的“淡化文革”精神。王光美女士作为该党的第二把手和国家主席的夫人，由她发起两家的聚会，聚会情景由毛家后人撰文披露出来，大大“强化”了这种“淡化”行为的戏剧效果，使其具有表率作用。

王光美女士有幸在她的敌手倒台之后又活了三十年。但是，三十年中，中共的政治尘埃始终不曾落地。三十年，在王光美女士说来，并非短暂的一瞬。在劫后余生的悠长岁月中，王光美女士随着自身处境的变化，当然会有她自己的盘算，也会形成一套属于自己的、翻新了的“论域”（discourse）。当初，王光美女士反对称刘少奇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如今，却自称是毛泽东的“好学生”。人们渴望知道，在王光美女士今天的“论域”里，她要人们“做毛主席的好学生”，这仅仅是一句口号呢？还是具有更实际的涵义？

王光美女士的逝世，带走了她由于各种原因而不想说、甚至有意掩盖的历史秘密。而这些秘密，由于中共实行“黑箱操作”，局外的平民百姓很难知晓，这对于迫切需要了解历史真相的当代中国人和后代中国人说来，不能不说是巨大的损失。

对王光美女士后来种种“亲毛”的言行，有人认为她是在“作秀”。笔者认为，不计杀夫之仇而与毛泽东的后代和解是无可厚非的。问题是，王光美女士为什么要在各种场合，反复宣称自己是毛泽东的“好学生”、做这些充满了矫情之谜的“亲毛秀”呢？人们对王光美的动机有很多推测，而在效果上，王光美出尔反尔的表现，归根结蒂，在主、客观上都为毛泽东的和她丈夫的那个党再立了新功。

探讨王光美女士晚年对毛的态度的“反复”，这绝对不是出于好奇，而是为了让我们自己从多年来由愚昧导致的盲从中“解魅”，像康德所说的那样，敢于求知，勇于运用自己的理性。“解魅”的目的，借用刘源将军当年竞选演说词中的一句话，是“为了避免灾难重演”；更是为了“文革”死难者的血，包括王光美女士的配偶、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血，不要白流！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             |          |
|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             |          |
| 中文文件：hwx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             |          |
|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a href="http://www.cnd.org/">http://www.cnd.org/</a> |             |          |

---